

中国外交面临的挑战

裴敏欣：基本上，我十分赞同时教授的主要观点，就是中国在长期内将面临很严峻的国际战略局势，那么这不光是从那个地缘政治和美国超强独霸的这个战略现实来说，主要还是看中国，因为它由于经济的对外依赖程度，特别是关键资源、外来资本、对外贸易和能源。比如说，七八年内中国 50% 的石油要进口，而且中国没有自己的远洋海军能力来保护自己的航线。还有最根本的，中国的几乎所有的金融资产都是在美国的银行当中控制的，我去开过一个会，遇到纽约银行的一个经理，他告诉我，你们中央银行所有的外汇储蓄都是我们托管的，事实上就是整个中国的外汇资源，美国人如果今天他下决心要冻结你的资产，（**时殷弘：**要

打仗当然要宣布冻结了。）你一点都没办法。所以呢，中国的弱势并不仅是硬件。

这是一种全面的战略弱势，另外，地缘政治的挑战也很严峻。这就是中国在东亚的兴起，刚才殷弘兄讲的，中国的兴起的确引起周边主要大国的害怕，特别是印度。印度对华的担心在有某种程度上超过日本。因为印度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新兴大国，日本已经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没落的经济强权。当然，这两个国家都对中国的兴起抱有很强的戒心，这就为美国在亚洲地区构造围堵中国的战略联盟提供了很现实的条件，再加上台独问题，这一系列现实表明，从中长期来讲，第四代的领导人面临的外交战略挑战是十分严峻。但是近期情况并不坏，就是在三到五年内，由于反恐战争和伊拉克问题，美国暂时转移战略重心。这给中国一个很短的机会窗口来有限地改善自己的战略地位。这里要提出一点，国内对最近中美关系这种改善的实质性是看错了，国内有人认为是根本改善，是美国的一个战略性调整。但是在美国来看，许多人完全是把这个看作是一个暂时调整，把中国搁在一边，因为它顾不了这么多。（我在华盛顿听到的美国战略界的所有的分析，都是把中国看成是美国最重要的长期对手，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今后的关键就是如何利用三到五年这个机会窗口。这个机会窗口一旦关了，你就不再可能再有这么一次机会。当然，如果共和党政府 2004 年竞选连任，美国的所谓“新帝国主义”战略继续推行扩大的话，它也许会找到新的对手，但这只是一种侥幸的希望，不能把国家的大战略建立在这种希望上。从美国的那个眼光来看问题，中国无疑是它的潜在对手。但我认为美国的这个基本战略判断是错误的，由于国内的许多问题，中国不可能成为扩张性强权，但不管中国的现实如何，美国出于其独霸心态，必须要买这样一个保险的政策，它不买这个保险政策是对自己的国家利益不负责任。

时殷弘：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可以跟美国谈反恐战争，这表示我们的政策的现实性条件。中国政府表示支持美国反恐战争，官方并没有因为“9·11”而幸灾乐祸，我们政府当然是保持一个比较高的态势，但是中国的新闻报导，包括中央电视台，就是另外一回事。媒体给我们的介绍，好像我们希望这个战争打输。

（**裴敏欣：**但我跟你讲，你这些讲的美国人早就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不是傻瓜。）这是第一个阶段的特征。第二个阶段就是从汤曜明访美到今年北戴河会议。

这个阶段中我们对美国的力量优势，我们对它强烈的单边主义，对它的霸权态势，对它加强同台湾的军事关系，对它不肯宣布“东突”为恐怖主义组织，我们的反感是非常强烈的，甚至愤怒。另外，对美国反恐战争政治意图产生了怀疑，特别是它在阿富汗打赢以后。这个阶段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发展，国内没有太注意，国际上也没有太注意。江泽民访德的时候（4月份）宣布了三条中国对于反恐战争的态度、三条原则，强调不能因某些实际问题，就是伊拉克的行为等而干扰世界大局，不能借反恐实现其他目的。这是一个象征。这个时候中国对美国非常不满。这个时期中国政府的官方表态或者中国媒体都有体现。中国政府和大众媒体强烈谴责美国加强同台湾的军事关系，强烈谴责布什的“邪恶轴心论”，强烈反对、谴责布什“先发制人”战略的逻辑，强烈谴责他那个政府被披露出来的所谓核态势的重新评估，还有强烈地谴责美国国防部 2002 年关于中国军事能力的这个报告。这个时期中国对美国很恼火。然后是第三阶段，这就是最近几个月。中国对美国态度、对美国政策发生重大的改变，朝着温和方向改变。这几个月的对美国的软的程度，甚至某些方面是使我们都感到吃惊。当然同时中美关系也有相应的改善。我觉得是“9·11”以来，那么多辩论，那么多开会，那么多讨论，有一个东西我们是认了，这就是美国强大的现实。第二，中国政府部门深深感觉中国经济上依赖美国。为什么我要谈这个呢？“9·11”以后，包括个人思考，包括各种层次的会议，很多人都在考虑这个问题，都在辩论这个问题。这个一年啊，我们的基本认识和态度就走了那么一个 O 字形，转了一圈，回到出发点。这很有意思。这表示什么呢？表示我们今天这个对美态度的温和有它很深刻的原因，但是由于我们不久以前才经历这个变化，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对美态度、对美认识仍有种复杂暧昧的成份。

裴敏欣：我认为这种情况是很难持续的，因为第一，国内本身没有一个很强的共识。现在共识的中心就是“中国强大之后”，咱们暂时不谈中国强大之后会怎样，就现在来说，中国本身是一个很现实主义的国家，中国是以现实主义眼光看待世界。因此呢，它目前对美国的相互定位还基本上是一个零和的心态。它如果说用这种心态定位呢，就不免突出弱者受欺这一现实。从理想主义的角度来说，中国需要突出的，就是用一系列的实际行动表明，我不但不挑战你，我要真正地融入一个世界的安全体系、政治体系之中。因为中国的经济体系基本上已经融入，但是它的安全体系基本上就是一个自由户，因为这个自由户的块头太大，它总归会引起邻居的担心。（吴国光：中国能不能够接受在亚太地区一个以美国为领导的安全体系？）（时殷弘：问题在于中国不愿意，美国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认真地去想，能不能把中国包括进一个安全体系。）我在美国跟人家谈时有这样的感觉，他们最感到吃惊的就是中国如果在东亚地区改变自己的战略态势，变成一个愿意以集体安全为架构的合伙者，我觉得美国没办法来对付这个新战略姿态。东亚的集体安全不能中国为主、日本为辅，而应是平起平坐，只能是平起平坐。你要知道，日本如果要跟中国好，它一定要相对减弱甚至最终放弃和美国的这么一个小伙计跟大老板的关系，因为美国在东亚的战略优势的中心点就是日本战略轴心，所以你一下去把人家那个轴心给端过来，你要花大代价，（吴国光：你要花更高

的价钱 挖角”。我不认为中国能够把这个角挖过来。现在的情况下是做不到的。) 九十年代的确有一个战略机会，但是中国没有抓住。最近日本国内对中国的态度有根本转变，所以现在我们的也许是马后炮了，但并不是无可就药。(吴国光：我们对日外交的心态是有问题，一直以为“我把美国搞定了，你日本要怎么着”，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时殷弘：就我们现在的外交而言，我觉得胡锦涛能做的一个大的比较有创意的政策大概就是中日关系。我觉得，在中日关系上，我们要做五方面的事情，这五方面的事情就是说，能不能做，政府能不能有这么一个胆量，并且公众一定要支持。第一，我们在一段较长时间内，要大致满足日本对历史问题的态度。日本政府对日本历史上对华侵略罪行的认识目前达到那个公开反省和道歉程度，中国可以基本满足，就不要再要它进步。不要让历史问题争端在较长时间内主宰对日外交的立场。第二，要积极地依靠强有力的政府政策促进和调控，争取大幅度增加日本对华进口和对华投资，以便达到一个地步，就是使日本政府和公众深切感到，中国是帮日本缓解经济上的困难。第三，就是对日本军事上的扩充、国防政策的某些修改，我们要采取内心适当警觉、外表足够大度的政策，改变动不动就日本走军事大国道路的可能性公开表示担忧的做法，积极以各种方式构建中日两国之间以及中国与美日军事同盟之间的军事互信机制，对此既不抱幻想，也不无所希望、无所作为。还有就是要反复向日本政府、政界、公众舆论说明，中国军事现代化决无扩张主义，反复要向日本人表示，只要台湾不独立，就决不对台动武。第四，就是在有关东亚地区安全、政治合作、经济稳定等重大多边问题上，我们要以实际行动欢迎甚至主动邀请日本以大国身份参与，中国应当使日本政府和公众得出一个比较明确的结论，中国把日本当作大国看待，既是今天的世界经济和区域性大国，也是明天的东亚政治大国，要本着大国协调与合作的根本原则，处理中日在东亚国际政治与经济当中的关系。近期内有这么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大大加强同日本的双边和多边框架内的合作，促进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就当前问题来说，中国在同东南亚形成自由贸易区这个过程当中，采取尽可能跟日本协调而不是竞争的基本政策，现在很可能出问题。那么中日之间，由于在东亚有这些关系，朝鲜半岛、东南亚经济整合，还有日本的军事力量扩充和中国自己的军事现代化，所以中国一定要确认，中日之间有一个真正的战略性关系，要有战略性会谈。现在中国仅是把日本当经济大国，今后要逐步深入中日政府首脑级的战略会谈和部门性的战略性的协商。就是说，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体制改革问题上，中国从政策声明和实际态度上，两方面要一视同仁地看待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问题。(裴敏欣：我补充一句，因为最近安理会的行为大家也知道，它只是美国老大当家，中国在那里的那一票也是没什么用，那还是顺手人情。如胡锦涛第一次访日，就此宣布，要让人出其不意啊，积极支持日本担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很希望看到这样的前景，这就是大国风度。(吴

国光：在第四代领导人中，现在对日外交是曾庆红握有优势的，在韩国问题上也是曾庆红在主导，真正你如果要采取动作，一定是曾采取动作，而不是胡采取动作。如果是胡采取动作，他就是重蹈胡耀邦的覆辙。）但是现在有一条有保证，就是经过“9·11”以后，到现在这几个月，既然认识到美国的实力，公众舆论基本上——尽管不满意——也基本认了，这就是一个时机，就是说顺便也对日本做顺便人情，在这个关键时候，中日之间的这个公众舆论问题和我们教育公众啊，国内政府教育公众，可能比较好解决。（裴敏欣：在日本问题上，我讲几句啊，就是说，看待中日关系时，不要走入另外一个误区，就是说把中日和好看成是把美日隔开，这样做是绝对行不通的。应把中日友好完全看成是对中国根本的国家利益有利。）这样说，我们始终把日本看成大国，中日友好同中美友好一样重要。胡锦涛要有所创建的话，中日关系改善是机会。这个问题如果做好了，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比较主动，美国有点慌了，那个时候美国可能要向中国主动示好。（丁学良：我说，最可悲的一点就是说，在中国所有弱势的新继任的领导层中间，他最不敢去碰的就是所谓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如果中国是一个经济相对封闭的国家来讲，这个事碰不碰，问题不大，现在因为中国是对国外依赖的，这个问题就不可能去碰的，中日和好不可能成为创新的一个领域。）我觉得，其实讲起来，中国公众舆论的弹性很大，（丁学良：也不是弹性大，中国老百姓好蒙。）你看看啊，我有时也感到死心，为什么？在北戴河会议之前，中国公众舆论对美国如此反感，公众对中国政府对美国政府软十分不满，居然江泽民能够这几个月对美国这么大的让步，公众也认了，这就证明中国的领导人还是能够操纵公众的。（丁学良：好哄有好哄的好处，好哄有好哄的坏处。好哄坏的地方，你比如说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在国外的時候听人家老讲，他说你们那个南斯拉夫大使馆的问题，学生上街游行示威，还有一个中美在海南岛撞机的问题，尤其讲到台湾问题。有人说，如果北京方面再让再让，中国老百姓不允许。他们反问，你们说不允许，你们中国的老百姓对中国政府哪一点没有允许过？）但是如果是一个弱势领导

人，他在他的位置上，他很不愿意看到大家都埋怨他。（郑永年：不是中国老百姓不允许，是高层斗争可以利用这个东西来搞你。）

徐成：刚才因为讲到这个，从对美关系讲到对日关系，我先就你这个讲，对日关系我先讲两个。一个就是你刚才讲这个策略是不是可行啊？当然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国内的因素，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些问题呢恐怕不是那么简单，因为中国对日本的问题和对美国的问题情况不一样。中国对美的这种问题完全是政府一手造成的，是服务于政府的外交政策的，而中国对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有根深蒂固的民意基础，这恐怕不是那么简单，很不容易，包括钓鱼岛这样的事，你很难一下子去解决，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外交问题啊，从国内操作起来说，难度非常大。第二个来讲，（丁学良：你讲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中国政府对美国方面的自由度大于对日本方面的。）当然大得多！第二个就是说，日本它对你这样一个政策调整，它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它也有个战略，整个大战略构建过程，我觉得它也不一定顺着你的这个逻辑跟你走。几年前写了一些短文，就是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美国对中国战略的理论基础是什么，比如说，冷战思维、民主和平理论、霸权稳定理论、势力均衡理论、文明冲突理论等等。你从几个角度来看，可以分成几个层次来解释。文明冲突理论没戏。因为这个理论并不成熟，而且在整个以国家利益为单位的情况下，文明冲突很容易化解，毕竟中国代表的儒家文明跟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没有那两个文明冲突那么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美国真是这样考虑，很容易化解这个问题。那么第二个呢，从民主和平理论来讲，所谓政治体制这方面来讲，这个也容易化解。为什么容易化解，当然我们不是说中国的政治体制一夜之间发生变化，但是中国领导人如果想在这方面做工作的话，他完全可以从意识形态上，从宣传手段上，就这方面来讲呢，采取一个比较巧妙的外交政策，比如说我们中国也准备建立民主机制，但这个过程一定是很漫长的一个过程，基于中国的现实政治经济考虑，的确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西方国际社会要有耐心，你打出这样的旗号以后，从政治体制上来讲，它没有理由再从这个问题来给你发难，我觉得从外交手段来讲，我们不缺乏这个手段。那么相对来讲的话，从势力均衡、霸权稳定理论来讲，更难一点，因为这两个东西呢，它涉及到两个层面，一个是经济层面，一个是安全层面。相对来讲，我觉得刚才大家讨论的就是说，从安全层面来讲，这个问题容易解决一些。换句话说，从安全角度来讲，中美之间的根本利益冲突并不是很大，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不是一个扩张型的强权，那么我们通过加入或者是中国创建以美国为中心的，或者中国和美国同时扮演重要角色的这样一个安全架构的情况下，是有可能化解的，或者至少打消它对中国的疑虑。这种外交的空间是有的。那么最难化解的或者说根本无法化解的是，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的崛起对美国整个战略格局和经济的冲击，这是你没有办法化解的，这个问题永远存在，就像美国和日本之间永远存在这个利益冲突，（郑永年：这是民族利益问题。）对，就是说中国要判断一个从外交手段所能化解的它对你的哪些敌意。（丁学良：不是化解，减缓。）

(裴敏欣：减缓和有控制。)

丁学良：不要让它成为爆炸性的问题。除你刚才讲的几个问题以外，我特别要强调一点，就是说，即使假定现在中国的最高层领导是一个强势领导，就是比较有自信心的领导层，他能够看到对日调整这种调整法，对美国这种调整法，甚至包括对东盟的调整法，这些方面啊，对中国长远的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有好处。但即使他如果这样做的话，还是碰到一你感到很难处理的台湾问题。它将注视你的调整，它会利用你的调整过程中出现在它看来对它非常有利的机会来最大化它的诉求。在这个方面，台湾做得比我们考虑得不知道细多少，因为它的安全和生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它一定会利用这些机会，最后来说，搞到你叫“哎哟”，你马上就不能再搞下去，再搞就乱套了，这种可能是非常非常大的。(裴敏欣：

它不会这么甘心情愿地束手待毙。)就是注视你，注视你这个调整的大棋局，而且你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就是在美国有一部分人，不论你中国以什么样的好处来要跟台湾两个解决这个关系，他们都会反对和捣乱。这批人是确实存在的，问题是中国哪怕是做了很多事情，他们想帮台湾应付这些挑战。这是我们海外华人看得很清楚的。郑永年你知道上次新加坡会议那个召集人的。他现在在网上非常活跃，每天都在网上留言。每当中国大陆的学者提一个政策建议，他马上就跳出来了，提出一堆不同意见，其中心意思是说对现在的北京政权，它做任何事情或者讲任何话，你都不能相信。他在台湾并不是极端分子啊！还算一个年青的国民党党员。就连他这种人都对你这样根深蒂固地不信任，你能怎么样？再插一句，美国国务院管安全的那个官员，两年多以前我们有一个午餐会，大家就是谈中美关系，中国到底对美有什么样的态度，后来那个人说了几句，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我们百分之百地确定，中国的对美政策，江泽民只能亲美。为什么？你查一查，司局级干部以上有多少的存款存在美国。

裴敏欣：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从政权深层来看，共产党这个政权在国内毫无对手，唯一能够整它的，就是老美，

吴国光：七、八年以前，93年、94年、95年，我们在美国为第三代领导人想了多少有关中国国际政治、外交方面的东西，最后他们做成什么样子？他按照国家利益做的，还是按照个人利益做的？有些东西他采纳了，是因为对他个人利益有用。如果我们能够想到一个东西，对他个人利益又有用处，也能同时和国家利益相吻合，还能够推动中国的转型，这样一个东西。(裴敏欣：这只能是一种很战术层面的，就是说你到外面去讲什么样的话，做什么样的一些很表面的动作，因为我们讲的是一个战略性的问题，你战略性的问题必定牵涉到一个更深层的政治问题。)就是这样啊，现在就是要一个战略性的东西，不是一个动作的问题。

时殷弘：我想这样，中日关系要有所作为，如果要中国单方面主动，中国国内

公众舆论肯定是难做的，但是如果它的政治领导人有足够的自信心的话，这还是可以操作的。第二，就是日本方面会不会呼应，我觉得这也问题不大，我觉得有若干因素呢，有可能使日本和中国一样，也可以变得比较认真地期盼与中国真正和好。这些是什么因素呢？第一，日本自己也很苦恼，它跟中国相邻这么一个地理位置，长期战略竞争并不是好事。另外，它经济长期衰退，正常贸易有需求，投资也有需求，它也希望多做一点生意；（丁学良：而且还有好消息，我最近看到的，日本姑娘喜欢嫁中国丈夫。）第三，东亚经济格局改变了，日本要在现在这个中国兴起的背景下，在东亚经济格局里面，维持日本的影响，也只有寻求与中国改善关系。日本也只有跟中国协调，才能在一个改变了的东亚经济格局当中维持日本的影响；另外，在东亚国际政治特别是东北亚区域安全方面，有一些问题，日本只能跟中国协调才可以解决的，如朝鲜半岛、领土争端等等。最后，日本要维持足够的安全感，要实现日本成为东亚区域的政治大国，你也得跟中国谈。日本对美国也有一种担忧，就是美国，特别是一个过分霸权主义的美国，或者过分单边主义的美国，或者过分神经质的美国，它可能就像一个在瓷器店里闯祸的牛。所以日本对美国这样一种担忧，就是东亚稳定跟日本自身的安全，可能由于美国变得太具威胁性而受影响。美国如果采取一个太莽撞的对华政策，太具威胁性的对华政策，这个对日本不利，因为日本战略环境会变坏。日本还有其他长期性的问题，但日本老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日本人自己也认识到，它处在东亚，但是跟它的主要邻国，韩国跟一个巨大的中国，总是心理上、感情上有严重的隔阂。日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它自己也知道。如果中国积极去做，做得也比较聪明，我想这是一个可以长远来说对中国大有好处的一个外交创意。

郑永年：我插一句。因为我去日本呆了12个星期刚回来，跟他们有一些接触，包括以前的大使，我觉得这个条件不存在。因为日本啊，你想，从那个打败俄罗斯到全力倾向西方，一直有良好的自我感觉。要把它的重心调整到中国来啊，首先这个心理条件不存在。还有呢，就是最近有新的发展，就是他们外务省的大幅度人事调整。今后，他们的中国政策完全要由不懂中国的人来掌握。看来前景并不光明。

时殷弘：不过，你自己想想看，中国现在对日态势、对日政策、对日话语都对日不友善。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人当然很感冒。如果中国方面有一个高姿态，我想日本方面会有呼应。（郑永年：中国花这么大代价，花这么大的精力，仅仅换来一个中日关系的缓和。）其实没有什么精力，实际上这些代价都是空的。（裴敏欣：代价主要是国内的政治因素，这方面精英之间有共识。如果他们能够看到长远民族利益，还是付得起的。）我同意。精英也有本事在政治上强势化，完全可以承担这个代价。

裴敏欣：现在看来呢，这个机会窗口可能已经关闭，就是说日本国内已经形成

的这个反华情绪恐怕一时难以化解。这并不是说中国就无所作为了，如果中国在日本争取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事上有正面表示，我并不认为中国失去了什么东西。（吴国光：不一定。你现在在安理会里，你要拉俄国、法国、德国等等，但日本你是拉不过来的。）但安理会的价值将贬值。许多国家可能进去了，像南非、巴西、印度等等。安理会目前的价值有多大也是一个问题。中国可以做顺手人情。

时殷弘：我这样想的出发点，并不是因为中国从中日经济中马上就能够得到多少好处，长期的利益是很大的。中日之间两国民众的敌意的加深对我们将来会很麻烦。

吴国光：我觉得过去十几年，第三代领导人在外交上有两个大失误。一个就是江泽民 1998 年访日那一次，那是一个很大的失败。再一个就是对科索沃战争的态度。我想他们基本上就是这两大失误，所以你刚才讲的那个我是有共鸣的。（**裴敏欣：**两个都是国内外交重大判断失误，可能因为国内政治，领导人听不进异议。）

时殷弘：我再提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我们面临一个这么强大并且对中国充满戒心的美国，我们面临一个台湾问题这么棘手，我们还面临一个对华敌意日益明显的印度，我们经得起经不起同日本之间形成的长期僵硬关系是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

郑永年：你说的这个是在应该层面，我觉得是可以做的，我完全赞同，但是在中国的体制下，绝对不可能做到，因为你做了，显示出某种开放迹象，马上就来了法轮功，来了什么功了，你就完了。

时殷弘：其实一个外交最大的秘密就是，你什么都不做，就是不可能。这种事情就根本不要去想。但你如果一步步去做，还是可能的。

裴敏欣：咱们接下来谈台湾问题。（**吴国光：**这些年来关于台湾问题也讨论过太多了。）最近从美国角度来看，许多人认为中国大陆有一个成功的战略。这个战略有四个方面。中国都把握住。政治上，它采取孤立陈水扁，它自己认为有效；外交上，虽然有小的麻烦，但是基本上台湾还是在一个框架里面；那么经济上就不谈了，这个优势就是说，绝对是很明显的，压倒性的优势；军事上呢，它认为目前的军事准备，进行军事阻吓呢，也是很有效。那么这种情况下呢，美国对中国对台政策的判断认为，中国现在并不急，主要就是自信心相对增强，还有呢，四个战场上其中三个是僵局，军事是一个僵局，跟那个外交包括两岸政治对话这个僵局。但至少经济的发展趋势将增大陈水扁的岛内压力。虽然不能造成岛内改朝换代，但至少让他日子不好过。但美国布什政府对台湾问题的认识出现了本质性的变化。在华盛顿，许多人把台湾完全看成是一个由于中国威胁而造成的一

个区域性安全问题。因此，它跟以前那些“一个中国”的承诺成了空话。实际上，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空洞化确实很厉害。只要它这种看法不改变，只要它把这个台海现状不稳定的来源定位有问题，对大陆就很不不利。美国目前的定位并不是台湾内部要求突破“一个中国”框架，它没有把这个作为是政治上的不稳定来源。相反，它是把大陆的军事威胁视为台海趋势不稳定的根本原因。在这么一个框架下，它的对应政策的中心就针对中国的那四个对策里面的军事对策，（丁学良：**就是保持台海的军事平衡。**）这就创造了一个潜在的冲撞机制。这就是说，今后的军事不平衡是必然的，在军事上，中国不断增加实力，一直在加码，它认为对台湾军事威慑力度不够。它要加码，但美国也要来反平衡，这时候呢，一定会引起中美之间的摩擦，这是纯战略上的冲突，政治上的冲突。最终这种冲突会破线。中国给自己定的线就是美国不能卖神盾舰。上次美国对台军售没突破。但是美国的话讲的很硬。它说，“我们对台湾的任何销售武器，完全是根据台湾所受到的威胁决定。”这就是说，你要导弹部署，现在是 400 个，要增加到 600 个，我就不能有所反应吗？它是这么想，这是你解决台湾海峡安全问题自己能做的。你不来做，倒反过来指责我。（时殷弘：**我先补充一句。美国现在就是关于台海军力啊，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光是大陆对台湾，就是美国已经确定，大陆不但要打台湾，而且为了打台湾，大陆如果要打台湾的话，要重创美国第七舰队，所以美国现在军力平衡措施是因为我们准备跟美国打仗，美国是准备要跟中国打仗。**）对，这一点就是美国比两年前要明确得多。美国的军事将领公开讲，毫不掩饰，他说，“我们第七舰队的任务，就是要干预，在台海战争当中进行干预。”

吴国光：你讲的这是一个基本的格局，我想把这个问题再拉回到第四代面临的未来的发展的一个框架当中来。我觉得，可能未来十年，如果所谓‘第四代’稳定的话，那么，在他们这个任内，台海问题上的决定性发展可能就出现了。这里有几个指标性的年头：2004 年是台湾总统换届，2008 年又是台湾换届。如果陈水扁不能在第二届任期内完成独立建国的使命，我想他这个总统是白当了。（时殷弘：**而且大陆现在对台湾 2004 年，基本上已经比较倾向于陈水扁连任。**）2007 年，则是中国换届，那就是说，你第一届无所作为，第二届就不能这样拖下去了。我看，对北京来说，这 2004 年还好对付。一个多月以前在台湾，他们就问，“如果 2004 年陈水扁再次当选，你觉得他们第四代会怎么样？”我说，“这个……，上次没怎么样，这次也不会怎么样。”你当时第一次当选都没怎么样嘛，这次第二次当选能怎么样？就是说，到了 2004 年，北京内部可能会说不必太紧张啦，不必有什么压力啦，‘听其言观其行’嘛。（时殷弘：**关键在于现在大陆怕什么呢？不是怕台湾哪一天真是要把这个“中华民国”给去掉，要用“台湾共和国”**

或者怎么样的，叫你到这个时候，第四代领导人面临的最大的可能，困难局面就是，打也不好，和也不好，但是你必须就“是打是和”作个决定。）所以，我觉得，2008年可能是一个关键期限。（时殷弘：而且李登辉前一段时间讲2008年要独立。）他讲2008年独立建国。（时殷弘：这个大陆上非常注意。）对，2008年还有个奥运会。我觉得，大陆方面对这个东西并没有什么别的准备，就是已经用出来的这几招，到了最后，台海问题没有别的出路，就是一战。（时殷弘：但是从政府领导人讲，如果到时候将你的军了，你平常的军力等各方面甚至国民的战争意识都没有做好准备，在这个时候就麻烦了。）（丁学良：可是，我们的牛皮已经吹得不得了了，对国内的误导民情太明显了，说什么我们导弹可以打到哪里啊怎么样。）（时殷弘：我告诉你，国内民众取得信息啊，一方面他们也看报，看报他们都是很乐观的，但是比如说，我是国内老百姓，有一个亲戚是军人，或者你开一次会，他是军方，内部会议他讲实话了，告诉你的信息完全相反。你说中国老百姓也不是光是看报纸的啊。）（裴敏欣：台湾这种“将军”啊，很难是那种有预谋的计划，因为有预谋有计划，美国人不可能不知道。）台湾现在对付美国人的办法就是，我事先不告诉你。从“两国论”开始，它就按这个办法做了。它说我事后告诉你，派人来给你解释。（裴敏欣：老美已经吃过亏了。老美不是笨蛋，台湾知道，老美现在跟它讲得很明确，“你惹出来的，我不管你。”你自己倒霉。老美自己知道，跟核大国之间开战对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不理。的确，它知道能够把一个潜在的对手彻底打败，但自己也要伤筋动骨。）看得见的未来，就是到2008年。在这之前，台海目前这个基本的框架应该还是稳定的，但是我觉得2008年前后可能出现重大危机。

裴敏欣：2008年美国说是正好是选举年，台湾要是弄这个事情，就要自认倒霉。夏天正好美国换届选举，谁要那个麻烦，共和党一定要让自己的人来连任，谁把美国卷入和中国的战争当中谁承担责任。而且美国公众支持台湾的程度有限。就是中共打，也只是30%的人会支持美国出兵，何况如果是一个由台湾挑起的战争。

美国政府的干预将没有民意基础，它要是干预只能是精英决定干预。（时殷弘：但是现在呢，实际上基本局势很清楚，就是台湾问题，台湾不独也不统，保持现状，基本符合中国利益，还大体上符合美国的利益。）（郑永年：台湾人不一定这么考虑，台湾人可能也有幻想。）

丁学良：他认为“通”下去对他不利，你看看陈水扁对“三通”的这些反应。陈水扁原来反“三通”的时候定的这些条件，等到钱其琛的讲话出来以后，陈水扁的话又改过来了。他始终就觉得，在任何条件下三通他都吃亏。而且我要是台湾人，我也会这么想，我觉得这是很合理的一种想法。在任何条件下你要统一，他都吃亏。

郑永年：台湾问题有一个基本的规律，就是大陆早期想统一，现在是怕独立运动，它是反台独，不是促统一，促统一一点看不到，我看不到，任何人都看不到。我认为它那么打压台湾，不是促统一，而是反台独。从促统反台独这个转型过程中呢，什么事都是被台湾牵着鼻子走。还有一个跟美国的关系，美国对台湾的关系啊，是一个大人跟小孩的关系，我这么比喻。你小孩怎么调皮怎么闹，你大人可气可恨，打两下子，但最终都是你自己的小孩。（时殷弘：我告诉你，现在最麻烦的问题就是陈水扁吃准了这一点。）我说陈水扁是已经看到这一点，不管我怎么样，美国还是要保护我。

裴敏欣：他这种想法侥幸成功过多了点。因为在任何战略判断中，总会有 5% 是你不能确定的，但是这个 5% 是所有战略家都必须考虑的，它最终是决定因素。大家都知道，这 5% 怎么决定完全是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台湾毕竟是一个轻量级选手。它有一两拨千斤的潜力，但并不是一定能够做到一两拨千斤。所以说，它是三方最弱的一个，也将是受害最严重的一个。有一次，我问美国太平洋军区的前总司令，“如果台湾这么做，它能够得到什么？”他说，“如果出现最坏的情况，台湾是受害最大的。”

吴国光：这几个条件我们都同意。第一，美国是不愿意卷入这样的危机。第二，如果美国不愿意卷入的话，那么中国对台独的威慑就一定是起作用的，就是使它不敢走到那一步。在这个意义上，那台独本身呢，在中国的武力威慑下，不至于打破现状的这个因素。它一定是一个使现状不断地出现不安定状态的这样一个因素，但在中国无力威慑下，它不至于走到打破现状。（裴敏欣：但现在出现一个局面，因为我在美国听同行们讲，美国最近看中国的对台军事部署，认为这个军事部署是进攻性的，并不是说是威慑性的，其目的是要把台湾给拿下来。）回

到 2008 年，中国之所以一直没有动作，我看是因为军事准备不足。到了 2008 年前后，军事准备可能足了。（裴敏欣：军事准备看什么标准，如果美国卷入，中国永远不能军事准备足。）现在的状态下，美国不卷入你都不敢动，你都拿不下台湾，这个绝对是事实。（裴敏欣：对。到 2008 年，美国说，你要主动拿，我肯定卷入。这时候中国怎么办？）美国不愿意卷入和一个核大国的直接战争，这是明确的。问题不在于战争是谁引起的，那是个道义性的问题。不愿意卷入和核大国的直接冲突，则是一个现实判断。它美国绝对不会为道义判断所左右。

郑永年：从大陆这方面讲，我一直觉得大陆对台湾有一个失误，它一直对台湾方面抱有幻想，所以正因为它抱有幻想，（丁学良：现在它还是有幻想）这两年稍微清醒一点。因为抱有幻想，所以一直被它牵着鼻子走，搞得就很被动。根本区别就在于，比如说，你提出来，我们搞什么方式的统一，你一直还希望，认为台湾人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接受统一的条件，实际上这些条件是不存在的。根据我们对台湾的了解，无论是台湾领导人还是台湾民众，它基本的倾向就是“分”，就是要“独”，这个基本判断我觉得大陆应该有，但是现在我觉得大陆并没有这个判断。它幻想有一天它出一张牌，台湾就会回一张大陆想要看到的牌。现在你想好了，它永远不可能想“统”，它就是要“独”，这是你的第一判断。但是它为什么没敢呢？就是因为你的军事威胁。（吴国光：他这个判断也不是完全正确，就是说台湾主流民意一定要“独”，这个判断也不是太正确。）换句话讲，台湾如果没有任何外部威胁，它就是要独立。但是它为什么不独？……。第一判断就是说，军事威胁，它觉得中国，它要是真的“独”了，中国肯定要军事威胁；第二，它对在某种情况下它要“独”，美国是否对它进行支持，它也没底。如果不考虑外在的制约条件，它肯定是“独”的。（裴敏欣：一个是肯定性，一个是不确定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不敢“独”。那么换句话说，中国面临的听众是谁呢？我认为不是台湾民众，或者台湾民众是一个次要的听众。首要的听众是美国。两岸不统一，绝对是有利于美国利益的，它战略利益在这儿；但是在道义层面讲，美国支持台湾一是因为台湾是民主政权，二是因为用战争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美国决不能接受。

丁学良：陈水扁政府以及陈水扁政府的教师爷们，已经把这个民主资本发挥到非常淋漓尽致的地步。他们甚至说，中共对台湾的武力攻击和武力威胁，不仅仅是为了所谓的中国统一，更重要的是一个专制政权，是对整个美国在太平洋的利益、日本在太平洋的利益和国际社会在太平洋和全球战略利益的威胁。

时殷弘：我们面对的台独并不是说，今天我宣布台独，（裴敏欣：是渐进式台独。）

现在台湾是渐进台独，这个很难对付。第一，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哪一天它真正台独了；（**裴敏欣：台湾人自己也不知道。**）第二，存在一种可能性，关注这个可能性，就是你这个领导人，我昨天，我可以把这个，比如说修改中华民国宪法，认作是宣布台独了。这是一个可能，这种渐进台独非常难对付。第二，即使我们要“阻独”，而不是说“促统”，要“阻独”就要加强军力，但加强军力的话可能冲击我们同美国的关系，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裴敏欣：不光冲击美国，也要冲击日本，中国发展海空力量肯定要引起日本的担心。**）就中国的军事力量解决台湾问题需要而言，还是不够用。（**吴国光：我刚才第三点还没讲完，就是将来可能是中国主动打。**）现在设想我们主动打台湾。如果非打不可的话，将是一个非常有效、非常迅速、非常有限，把台湾打痛，迫使它到谈判桌上来与中国进行原则性谈判。这个战略想得美，但真正打起来变数多，很难把握。

裴敏欣：美国早就给你算准了，海滩登陆不可能的，光靠导弹不管用，一定要人过去的。美国已经算好了中国的作战方案——他们都是沙盘推演过。据我的美国同行说，中国一定会抢占基隆港，基隆港占了，因为离台北近嘛，马上就可以兵临城下，逼台湾上谈判桌。但我认为中国主动出击的可能性不大，任何中国国策的基本出发点是政权稳定，在 2008 年，影响政权稳定的因素很多，在台湾问题上不值得冒险。冒这种风险的，毛泽东肯定会，但第四代、第五代不可能。

吴国光：我插一句，刚才永年讲，中国的对台政策是从“促统”转向“防独”，我觉得这也是 1995 年开始作的调整，但是 2000 年以来呢，我觉得又有新的转变，就是它认为呢，它有一句话就是说，“防独的最彻底措施就是统一”。

时殷弘：现在这是中国面临一个基本战略选择。我多次在北京会议上讲过，我们说“阻独”、“促统”两件事情都一样嘛，但是呢，我们讲起来话就是要“促统”，“促统”台湾不接受，我们有的时候想，“阻独”应该是主要目标，“促统”是很慢的。它有时这样想，但十六大上陈云林对台湾问题的解释又互相矛盾，第一，就是重申江泽民说的“不能久拖不决”；第二，我们现在要把打击台独放在更优先的地位。这个意味着我们首先要“阻独”，但还有一种想法，就是他也知道统一要用另外的办法，有另外的时间框架。但有人还有一种想法就是，“独”的威胁一直存在，我们哪一天能“统”了，这个威胁就没有了。

吴国光：我觉得，对台政策的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不承认现实。如果承认现实，就是“两个中国”。你不承认“两个中国”，你就不知道什么是“台湾独立”。中华民国不是“台湾独立”。你说你北京是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唯一代表，可以；但是，实际上你不统治着现在全体中国人。如果你认为自己已经统治了全体中国人，那就表示台湾人不是中国人。

时殷弘：现在有一个思想，还没有形成高层的共识，但是已经作为一种可能性

在高层认真地提出来了，就是都认一个中国，但是在联合国可能有两个席位。当然现在还没有公开提出来。这可能是最后拿出来的价钱，如果三年前做的话，四年前做的话，这可以省很多钱。现在人家不接受。（郑永年：这个底牌早该亮。

陈水扁提出“未来一个中国”，我觉得你可以接受，这有什么不可以？现在本身就不是一个，没有统一嘛。接触了就好。）还有一个思想奇怪，这个高层想问题总是原则性的。

裴敏欣：目前你们看，刚才我描述中国对台政策的四个方面是否和在北京看比较一致？（吴国光：我觉得它在政治上对台湾的一些办法，不见得有什么优势。）那么至少说是僵局，就是“三僵局一个优势”。

时殷弘：基本上大陆对这个判断是跟美国人一致的，但是有一点可能跟美国不一样，我觉得大陆上还是希望泛蓝能赢，为什么呢，泛蓝赢了以后啊，独立的威胁不是那么令人担忧了。（吴国光：当年李登辉接受“一个中国”的时候，你不是照样压他吗？那个时候你不和他谈；等到他不要“一个中国”了，你就开始说，

要“一个中国”就可以谈了。）从大陆的角度来看，台湾人很坏的，陈水扁总是在很小的问题上释放善意，说“请你们喝茶”什么，美国人听了很开心，很放心，但实际上真正的行动像三通，任何实质性的让步他都不做。（裴敏欣：要跟台湾

人多打交道，就要领教他那个岛民意识，这没办法。但是你不能说，“我就是大人了，我就是君子了。”）现在大陆上实际上内部的心态是，陈水扁只要真正释放一点善意，愿意谈判，大陆就回应。但陈水扁坏就坏在口惠，一点都不实。（郑

永年：关键在于你要还抱着幻想。）现在北京有些专门搞台湾问题的，他对中央这个对政策一软再软也很不满，有人提出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至少作为一个砝码我们收回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退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这个立场，有人已经建议这样做了。也就是，我已经看透了

你民进党永远搞台独，我就是对你民进党采取强硬措施，（吴国光：那你等于是说，中华民国是台湾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大陆唯一合法政府，我就

跟中华民国谈，不就完了吗？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你不是面对台湾。台湾不是台湾的台湾，台湾是中华民国的台湾。）我觉得你讲的这个，两年之内很可能走到这一步。这个你用不着担心。（裴敏欣：不过这时候啊也开一个路子，你说你

认中华民国，美国干吗不认啊？你承认它是一个主权，这就不得了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刚才你提出，中国政府如果向全世界宣布，我们就要搞民主改革了，效果就不一样。中国政府方面担心什么呢？如果中国这样一讲，美国天天要求中国在政治改革，这不就使他满意啦？

郑永年：我建议要放弃幻想，它就要“独”，对此怎么办？现在我的底线是什么？

中国要搞民主改革，在民主的情况下两岸统一，统一的方式各种各样，这没问题，这是我底线，但是你得给我时间，我这个目的不是为了“统”，是为了“阻独”，我这个讲的有理嘛，国际上我站得住脚，我有道理讲是不是啊？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这是我的底线，你这个还不接受，你要“独”，我绝对不允许。（吴国光：有诚意的话，甚至我可以先在福建完全搞多党竞争，完全搞自由市场经济，完全搞民主，让你先看一下。）

裴敏欣：我在美国经常讲，不要讲台湾，因为台湾问题是一个黑洞，把所有的那么好的脑袋对吸进去毁了，因为它是一个死结。这里面牵涉到三方，并不是一相情愿的问题。

时殷弘：我觉得从北京来看，他们会觉得美国人就是可以想象的，但台湾人没法想像。（吴国光：无论几方游戏，主动权都在北京手里。）（郑永年：别的地方出的任何牌，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北京的牌能解决问题。）问题在于从北京的角度看，他们认为一切问题都在台湾方面。（孙立平：我问一个非常外行的问题啊，有一天假如说台湾改成叫“中华台湾共和国”？）北京绝对不能接受，不可能接受。

裴敏欣：如果台湾出现这类似事情，不到 24 小时你一定要有反应，有一个最后通牒的。然后马上跟老美讲，你来收拾。老美马上会热线过来说，我收拾，你先别动。但是，我们这些人都是没有做过“战与和”的决定，这种决策过程很难预测。